

北京大学
教育经济研究所、高等教育研究所

简 报

2010年第2期(总第126期)

2010年5月11日

2008年首都高等教育质量与学生发展状况调查报告 (本专科学生分析报告第一部分)

北京大学课题组

一. 调查目的与重点

2008年北京市全面实施“北京市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工程”，在加强学科专业建设和结构调整、加大对教学环节的投入、提高教学设施设备水平、加强教师人才队伍建设、注重学生能力培养等方面提出了战略性发展目标。质量工程旨在全面提升北京市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质量，使得首都高等教育在规模、结构、质量、效益方面得到协调发展。正是在上述背景之下，继2006年度和2007年度的大规模高校学生调查之后，在北京市教委和北京市教工委的支持之下，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在2008年底实施了第三次北京市《高校教学质量与学生发展状况》调查。

本次调查在继续关注高校“入学机会公平、教学质量、教学成果”三大焦点问题的基础之上，在分析框架中进一步强化了调研的现实针对性，将高校教学过程中第二课堂活动的实施、高校辅导员制度的推行及其与学生全面能力形成和思想道德培养之间的关联性纳入了考察范围。在以下的调查分析中，报告将从高等教育的入学、教学过程和产出三个方面展开分析，

以期全面呈现首都高等教育质量和学生发展的现状。

- 高等教育的入学选择：主要关注在高等教育入学选择过程中教育机会公平问题的现状。具体包括高等教育机会在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分配现状，考察近年高校学生选择中出现的社会阶层差距、升学路径和升学动机的变化以及学生资助政策的覆盖范畴和实施效应。
- 高等教育的教与学的过程：分别从高等院校和高校学生两个不同的视角，分析高校教学过程中高校教学第一课堂、第二课堂、高校辅导员的质量，通过高校学生的课程出勤、课余时间配置、学习行为等不同维度，考察高校学生的学习行为及其存在的问题。
- 高等教育的产出：主要通过学生学业成就和能力素质的形成，考察高等教育的教学成果。主要考评内容包括：学生的学业成绩、知识素养与能力、以及包括心理素质、独立性、人际交往能力、社会价值观等在内的综合素质。

二. 调查实施与样本描述

2008 年度《首都高等教育质量与学生发展状况调查》是在北京市教委的领导和支持下，由北京市教工委和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共同组织进行的。本次调查的主要工具是“首都高校学生发展状况调查一本专科生问卷”和“首都高校学生发展状况调查一研究生问卷”。调查问卷于 2008 年 12 月初发放，2008 年 12 月底回收。与 2007 年的调查不同，本次调查没有针对教师的独立问卷，而是对本专科生和研究生进行了独立的调查。问卷由北大教育学院课题组直接送交各调查院校，由各院校参与调研工作的学生工作处以及相关部门负责发放、回收和质量抽查，最后由北京大学课题组负责数据的录入和分析工作。调查具体执行和研究报告的撰写主要由北京大学“首都高等教育”学科群项目组成员完成。

在数据录入工作完成后，北大教育学院为调查院校相关人员提供了为

期 2 日的《首都高校学生发展状况调查数据分析师培训》。培训内容包括(1) 统计分析基础普及；(2) 首都高校教学质量与学生发展状况调查概要介绍；(3) 分析案例演示；(4) 各校自评报告的指导。本次培训促进了北京市各类高等院校教学质量和学生管理工作水平的提高。

本次调查的抽样工作分三步进行。第一步，课题组将在京高校分为“985 工程”高校、“211 工程”高校、一般本科院校和高职高专院校四类。从全部高校中共抽取样本院校 54 所，比 2007 年增加 24 所高校。其中进入“985 工程”的高校 9 所，比 2007 年增加 4 所；进入“211 工程”的高校 17 所，比 2007 年增加 7 所；一般本科院校 24 所，比 2007 年增加 16 所；以及高职高专院校 4 所，比 2007 年减少 2 所。值得注意的是，2008 年调查并未包括全部 2007 年参与调查的学校。

第二步是根据学科门类在选中高校内进行抽样，即根据学科门类，将在校生分为文史哲类、政法经管类、工学类和理工农医类，在各高校分别抽取 1-4 个学科门类。

第三步是根据在校生的学年分布进行抽样。本次调查侧重于本科生二年级（16.4%）和三年级（76.4%）学生，研究生中以硕士生为主（90.8%）。调查组向每一个被选学校派送本科生问卷 200-1200 份和研究生问卷 100-800 份。各高校可以根据调查需要对调查问卷数量进行适当增减。

本次调查实际返回有效学生问卷 29,806 份，来自 54 所高校，各校本专科生问卷回收率平均为 98%。在本专科生样本中，本科生占 87.85%，专科生占 12.15%，男性 46.31%，女性为 53.69%，比例接近 2007 年。其中北京生源占 40.19%，非北京生源占 59.81%，北京生源与 2007 年相比比例下降。隶属院校占 49.28%，市属市管院校占 50.72%，2008 年样本中央属高校比例增加。从样本的专业分布来看，约有 23% 的学生属于文史哲专业、31.4% 属于经法教管专业、29% 属于工学专业，其余 15.5% 属于理工农医专业。

三. 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与升学选择

1. 高等教育入学机会

(1) 性别

从性别结构看,本次调查样本中,女大学生的比例为 53.69% (在北京生源和非北京生源中,女性比例分别为 59.45% 和 48.45%),女性比例高于男性;从变化趋势看,2003-2007 年,女性比例分别为 49.0%、52.9%、56.3%、52.3%、53.5%,呈现稳定递增的趋势,即女生数相当于高校在校生人数的一半。尽管调查抽样可能会存在某些误差,但显然女性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方面并未显著地低于男生,尤其是北京生源女生的高等教育参与程度更高。

(2) 生源地

学生的家庭户口所在地是社会经济背景的一个重要标志。本次调查分析了学生来源的城乡结构。本次调查发现,来自县镇和农村的学生比例合计为 40.51% (该比例在北京生源和非北京生源中分别为 31.91% 和 48.34%),与 2007 年基本持平。从历年的变化趋势看,该比例在 2003-2007 年分别为 36.7%、39.7%、39.3%、45.3%、42%;在非北京生源中,从 2003 年到 2006 年,来自农村(不包括县镇)的学生比例从 18.7% 增加到 29.2%,增加了近 10 个百分点,但是 2007 年降为 20.1%。由此说明首都高校大学生中来自县及县以下地区者占相当高的比例,分析表明随着近年城市化过程导致农村人口比例的下降,北京高校学生群体中来自农村的学生比例呈现逐步提高的趋势。

(3) 家庭社会经济背景

在生源的家庭社会阶层结构方面,在本次调查从三个相关指标进行考察:父母的文化程度、职业和家庭收入。

■ 父母文化程度

在被调查的大学生中，父亲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下的占 25.66%，高中及中专、技校的占 33.54%，大专及以上者占 40.80%。与 2007 年相比，2008 年调查学生父亲学历为大专及以上者的比例显著提高，初中及以下比例下降。

■ 父母职业

从父亲的职业看，样本学生中父亲为国家机关和党群组织等和专业技术人员者的比例为 19%；父亲职业为办事员与有关人员和商业服务业人员的比例为 21%；父亲从事农林牧渔水利等和生产运输设备操作等的比例为 36.85%；属于新增就业人员、未就业和其他的比例为 23.96%。由于 2007 和 2008 年度调查中父亲职业分类不一致，因此无法比较两年数据。

■ 家庭收入

2007 年调查收集了父亲的月收入，而 2008 年调查询问了家庭的年收入。家庭年收入在 1 万元以下的学生比例为 36%；家庭收入在 1-4 万元的比例为 33%；家庭收入属于 4-10 万元的比例为 22%；约有 9% 的家庭年收入在 10 万元以上。比较 2008 年入学的新生和四年级学生，家庭年收入低于 5000 元的比例分别为 22% 和 19%；同时中高等收入家庭子女的比例相对稳定。这说明高校接受的学生中来自低收入家庭子女比例在增加。

（4）高考成绩

为了分析入学机会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分布，本次调查考察了不同阶层家庭子女的高考成绩。较高的成绩意味着较多的入学机会和较高的大学质量。

首先，从不同社会阶层子女高考入学成绩看，在同一院校内部，不同社会阶层子女高考成绩没有显著差异。以调查样本较多的北京工业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分别为 211 大学、一般本科和高职院校）为例，在北京生源（以剔除不同省份高考成绩不同可能产生的影响）中，不同家庭背景学生的高考入学成绩差别很小。以父亲的教育程度为例，

父亲教育程度为初中和父亲为本科毕业生学生的成绩在北京工业大学分别为 555 分和 554 分，在北京联合大学分别为 465.5 分和 464.6 分，在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分别为 396.8 分和 393 分。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同院校之间，父母的教育程度、父亲职业和家庭收入仍然会对学生的高考分数产生重要影响。第一，父母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下家庭子女的高考平均分均低于 491 分，父母教育为大专的学生平均分为 505-507 分，而父母为本科或研究生的学生平均分为 530 分至 550 分。这说明入学机会与父母教育程度正相关。第二，父母的职业同样与子女高考成绩有关。父母职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党群组织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或办事人员的学生高考平均分均高于 513 分，而父母职业属于新增就业人员、未就业和其他就业人员的学生高考平均分都低于 496 分。第三，家庭年收入低于 2 万元家庭的子女高考分数低于 496 分，而收入在 2 万到 20 万之间家庭子女的高考成绩在 500 到 530 分之间。

以上调查结果表明，同一院校内学生的家庭背景与高考成绩无关，但是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的确影响学生的高考成绩，弱势群体学生的高考成绩普遍偏低。

2. 升学选择

(1) 不同社会阶层子弟的入学选择

本次调查也考察了不同家庭背景学生的大学选择。研究着重分析了父母教育程度、父母职业、家庭收入和高中类型与大学选择的关系。

2008 年调查显示父母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下的学生被 985 或 211 等重点院校录取的比例低于 18%，而父母为本科生的学生进入重点院校的比例为 34%，父母为研究生的学生进入重点院校的比例为 44%。父母职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党群组织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或办事人员的学生进入重点大学的比例高于 28%，而未就业人员和不便分类的其他人员的子女进入重点大学的比例低于 21%。年收入在 4 万元以下家庭的子女进入重点院校的比例低

于 24%，而收入高于 10 万元家庭的子女进入重点大学的比例高于 33%。这一结果显示不同社会经济背景家庭子女接受高质量本科教育的机会并不均等。父母学历、职业地位和家庭收入同样影响学生进入重点院校的机会，父母教育程度较高、富裕家庭和高职业地位家庭子女进入重点大学的机会更多。

综合以上数据可以看出，首都高校在招生方面，从 2003 年到 2006 年，女性、农村和较低社会阶层子女的受教育机会逐步增加，这对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是具有重要积极意义的。但另一方面，来自较高社会经济背景家庭学生的高考成绩更加优秀、进入重点院校的比例更大。在促进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方面，首都高校还有进一步提升的余地。

（2）升学选择路径

除了与家庭背景相关，升学选择是否与学生高中类型有关？本次调查发现高中类型的确与大学选择有着密切的关系。样本中约有 66% 的学生来自重点高中、28.8% 来自普通高中、3.94% 来自职高和中职和技校。而在进入 985 院校的学生中，有 81% 来自重点高中，17.45% 来自非重点高中。进入 211 院校的学生中，有 77.45% 来自重点高中，19.96% 来自非重点高中。在高职院校中，62.31% 的学生来自非重点高中，13.98% 来自中职院校。因此，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偏向于重点中学的毕业生，不利于来自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的学生。有限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更多地流向在高中阶段已经享受优质中等教育资源的学生。同时研究发现，目前高校学生中高考应届生的比例为 84%，而往届生的比例已接近 16%。从 2005 年至 2009 年入学学生中往届生的比例分别为 12%、15%、19%、20%，呈现出逐步递增的趋势。为此，往届生已成为高校升学人群中一个不可忽视的主体。至于往届生的分布区域，往届生比例超过 20% 的地区包括安徽、广西、贵州、河北、河南、吉林、江西、山东、山西，并且来自农村和县镇的往届生比例明显高于城市学生。显而易见，往届生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落后地区。是否这类地区学生在高考升学中处于不利境遇？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再次选择参加高考？这些问

题有必要在接下来的研究中进行深入地探讨。

(3) 升学选择动机

随着高等教育就学机会从少数人的特权转化为大多数社会群体的权利，在特定的地区或社会阶层中，高校升学成为人们理所当然的选择，甚至在某种外部压力或约束之下，做出被动升学选择的非自愿性升学者（involuntary attendance）的比例开始明显增加。这种变化趋势意味着传统高等教育必须放弃或调整以往的所谓高校升学者均持有明确而强烈的学习动机的基本前提假设（Trow，1972）。本次调研设计了7个选项，尝试从多方位考察目前高校学生的学生动机。如果着眼于选择“同意”的比例，调查发现“找到满意的工作”（44%）、“获得更多更广泛的知识 and 技能”（43%）、“结交更多的朋友，拓宽社交圈”（41%）成为学生升学选择背后最重要的三项影响要素。这表明提升在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竞争力，强化自身的知识技能，拓宽自己的社会资本已成为当今学生选择升入高等院校的主要影响因素。相比之下，完全认同高等院校是所有同龄人梦想的地方的比例仅为31%，特别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完全因为对于所学专业抱有浓厚兴趣，而做出升学选择的学生比例仅占19%。

4. 高校学生日常收支与学生资助

(1) 日常收支

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和升学选择的分析表明，随着首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更多低收入家庭的子女进入了高等院校。因此高等教育的可负担性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政府控制学费增长的政策是否有利于提高学费的可负担性？学生日常开支的水平是否超过了家庭可以承受的范围？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次调查询问了学生每年的主要经济来源和支出情况。学生支出包括四个部分，其中学费约占46%，住宿费约占7%，伙食费约占30%，其他开支约占17%。

首先，学生的学年收入和支出情况受到父母教育程度、父母职业和家

庭收入水平的影响。以父亲的受教育程度来划分，父亲教育程度在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学生的年收入和支出均高于其他学生。前者的年收入高于 12,649 元，而样本的平均年收入为 11,969 元；前者的年支出高于 14,077 元，而样本均值为 13,170 元。同样，父亲的职业与学生个人的年支出也有比较明显的联系。此外，高收入家庭学生的收入和开支远高于低收入家庭子女。

其次，**不同类型院校学生支出水平并无显著差异。**比较进入 985、211、一般本科和高职高专院校的学生，调查发现学生的总支出水平并无显著差异。重点院校学生的年支出约为 12,700-12,800 元，一般本科和高职学生的年支出约为 12,600-13,700 元。值得注意的是，从支出的机构来看，重点院校学生的学费水平低于一般本科和高职学生，而前者的伙食费和其他开支高于后者。

再次，**目前的学费和学生支出与家庭人均收入相比，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本次调查发现首都高校学生平均学费为 6,057 元，年支出为 13,170 元。根据北京市 200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统计，学费已经占到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25%和农村人均纯收入的 56%。大学生年生活开支约占 2008 年城镇人均消费支出的 80%，约占农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 172%。这说明学费的可负担性对农村学生较低，而大学生开支无论对城市家庭还是农村家庭都是比较沉重的负担。

最后，**学生未获得满足的经济需求水平比较高。**一方面，学生目前的总开支水平高于自我汇报的总收入水平，多数学生处于收支不平衡的状态。另一方面，与家庭收入相比，不少学生的年开支甚至大于家庭年收入。例如家庭收入低于 5,000 元的学生的年总支出为 11,872 元，家庭收入低于 10,000 元的学生的年总支出为 12,204 元。显然，**这些低收入学生的家庭已经不能负担子女的教育开支，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低收入学生中仍然存在未满足的、对学生资助的需求。

（2）学生资助的覆盖特征与效应

上述对学生日常收支情况的分析表明，高校成本分担机制虽然减轻了国家财政压力，却加重了学生家庭、尤其是贫困学生家庭的经济负担。1998年高等教育扩张以来，我国开始推行大规模的高校资助政策。这种多层次助学制度的推行，提高了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和可负担性，促进了教育起点的公平。本次调查对学生经济援助体系的覆盖率及其在不同高校、不同学历层次、不同地域、不同学生群体之间的差异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还分析是否获得学生资助、学生资助类型和学生资助水平对个人学业成就和毕业后选择的影响。

■ 学生资助的覆盖范围

不少研究指出学生的资助需求仍然没有得到全部的满足。本次调查表明，从总体上看，目前高校学生资助的覆盖率还比较低。约有52%的学生获得了各种类型的学生资助。其中54%的985院校学生和57%的211院校学生获得了资助，高于一般本科院校（48.63%）和高职高专院校（46.52%）。

其次，从不同院校中的各项经济援助项目的覆盖率来看，不同类型的院校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高职院校和民办院校的劣势尤为突出。例如从国家助学贷款的覆盖率来看，985院校达到了9.52%，相比之下一般本科（4.39%）只相当于其一半，而市属高职的覆盖面仅为2.16%。国家助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贷款的情况于此类似，重点院校覆盖面高于一般本科，而一般本科又高于高职院校。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开始实行的国家生源地助学贷款分布情况。985院校和高职院校的比例均为0.33%，而211院校的比例为0.2，一般本科的比例为0.16。这说明生源地贷款的总体覆盖面很低，且在不同院校间差异不大。

第三，经济资助的覆盖率在不同学历层次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调查发现，无论是以需求为导向（need-based）的贫困资助，还是奖学金等以能力为导向（merit-based）的奖励性资助，现有的大多数经济援助都倾

向于本科生，对专科生的经济援助体系则相对薄弱。

第四，从经济资助的水平来看，父亲受教育程度较低学生获得奖学金、助学金和学生贷款都高于父亲受教育程度较高家庭的子女。此外，比较父亲职业与学生资助水平的关系可见，父亲从事农、林、牧、渔行业的学生获得的奖学金和助学金均高于其他学生，而父亲为国家机关和党群组织或者专业技术人员家庭的学生获得学生贷款水平远远高于其他学生。最后，各种类型学生资助的水平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而下降。

总而言之，奖学金和助学金的分配有利于社会经济背景较低家庭的子女，而家庭社会经济背景较高的学生倾向于获得学生贷款。调查发现不仅资助的总体覆盖面还比较低，而且与学费相比，目前获得资助学生享受的资助水平仍然偏低。目前平均资助水平约为3100元，而首都高校的平均学费水平约为6060元，因此资助尚不足支付学费。贫困学生仍然面临很大的挑战。

■ 学生资助的效应

已有研究指出了学生资助对学生个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沈华和沈红（2008）的内部收益率研究发现我国的国家助学贷款提高了个人高等教育的收益率。钟一彪和赖东菲（2005）对广东省高校的描述分析同样指出助学贷款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动力，但是也给他们带来心理压力。杨钊（2008）的分析发现，学生资助能提高学习成绩与课外学习时间。在毕业后选择方面，获得资助的学生更容易选择就业；获得学生贷款和助学金的学生选择就业的概率更高；获得较低学生资助的学生更容易选择就业而非升学。由此可见，学生资助的确帮助了部分贫困学生，但是也拉大了贫困学生内部的差距，未能惠及所有弱势群体学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学生资助分布的不均匀扩大了获得资助学生群体内部教育过程和结果的差异性。

本次调查分析了学生资助对个人学业发展和毕业后选择的影响。第一、从学生资助与学业发展的关系来看，首先，获得学生资助与大学成绩优秀

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获得更高的资助会显著地提高学生取得优秀成绩的概率。其次，获得资助显著地降低了个人学业失败的可能性，高资助水平进一步降低了不及格的可能性。第二、学生资助显著地增加了学生的课外学习时间，在各种类型的资助中，获得助学金和同时获得助学金与贷款的学生的课外学习时间有显著的增长，其他资助类型的影响不显著。在获得资助学生中，获得资助水平较低的学生花费更多的时间学习。第三、通过对资助与个人毕业后选择的分析发现，获得资助学生在毕业后更倾向于选择工作，而不是升学、出国进修、自主创业或其他。在七种资助类型中，只有助学金和贷款对学生选择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此外，获得较低程度资助的学生更容易在毕业后选择就业。

总而言之，通过对学生资助与大学生成绩、不及格科目、课外学习时间、高校满意度和毕业后选择的分析，我们发现学生资助不仅是个人学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而且与个人毕业后选择密切相关。是否获得资助、资助的类型和资助水平对大学生的发展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本期简报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首都高等教育质量与学生发展状况调查”课题组的部分成果。课题负责人为北京大学闵维方教授和文东茅教授。文责：鲍威、杨钊、朱红。）

本简报文章如需转载须事先征得本研究所同意，

并注明“转载于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高等教育研究所简报”字样

编辑：岳昌君

地址：北京市 海淀区 北京大学 教育经济研究所

电话：(010) 6275-3935；6275-5662

电子信箱：jianbao@gse.pku.edu.cn

本《简报》及《北大教育经济研究》（电子季刊）

邮编：100871

传真：(010) 6275-5662

网址：<http://www.gse.pku.edu.cn>
